

QINGNIAN LUNTAN

青年论坛

(=126)

1 月号/8

1986



刘道玉

《青年论坛》编辑部约我在“前辈寄语”一栏中谈点感想，作为前辈我实在不敢当，我想还是作为青年们的朋友来说话更符合我的身份。

我今年五十有余，已是“万事休”的年纪了。不过，我还不那么服老，不断磨炼自己的性格和毅力，努力保持青年人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据我个人体会，防止思想老化的最好办法是，多接触青年，多与青年们交朋友，经常阅读青年学者的论著，不断从他们之中吸取新鲜的思想。

《青年论坛》是在改革之年诞生的。她象小荷一样，在刚刚露头角之时，就格外引人注目，显示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值此创刊周年之际，我特向编辑部致以衷心祝贺，并希望青年理论工作者们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目前，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犹如汗牛充栋。但是，专一地反映青年理论工作者论著的综合性刊物，似乎仅此一家。对比之下，更显得这个刊物的重要，由此也可看出倡导者们的远见卓识。

我荣幸地被聘为《青年论坛》的顾问，感谢编辑部给我寄来每期刊物，使我有机会学习和增长见识。通常，我总要翻阅各期的要目，有时也看感兴趣的一些篇章。如果说感想的话，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创新和争鸣在这个刊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与青年的特点相吻合的。

青年人朝气蓬勃，思想活跃，正值创造发明的黄金时代。他们思想解放，不囿于陈规旧习；他们事业心强，具有革命的献身精神；他们锐意改革，敢想敢说敢干。但是，青年人毕竟还处在成长时期，他们思想尚不成熟，知识根基欠厚实，缺乏生活经验，甚至有时还会出点毛病。尽管如此，他们的优点却是主要的，他们有着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所没有的可贵的品格。

我国当代青年正面临着改革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伟大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要

在本世纪末，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任务，就必须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与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七五”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与这些改革相适应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也会发生改变。在这样的大改革的年代，有许多的新课题需要去研究，有大量问题需要去解决。我衷心希望青年理论工作者们，发扬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为开创理论工作的新局面，创立各门学科的新学派而发挥先锋的作用！

题头像：邵学海



破“天下达尊”

——贺《青年论坛》创刊周年

李泽厚

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公孙丑·下》）。这个几千年来不成文法，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非常有效。这种有效在某些方面也许有其合理度和“优越性”，但它深深浸延到学术领域，却并不一定是甚么好事，连开学术会议也得报官衔标职务（不是学术职称而是“长”、“书记”、“主任”之类），年高爵大，自然德劭。官衔大和胡子长、头发白的便必须或列前排或坐中央，或首席发言或最后总结。开会倒也罢了，无奈发文章出书籍也常按此办理。

这对三者全无而且憋头憋脑、毛手毛脚的年青人就颇为不利。于是乎，开会发言只好“阖闾如也”，未必能侃侃而谈；写文章也只好温吞如也，不得“立异标新”。于是乎，年青人也就积累了一大堆委屈、牢骚和私下议论，“地火在地下运行、突奔……”，终于“突奔”出了个《青年论坛》：年青人办起自己的刊物来了。他们自己主编，自己负责，自己组稿、审稿、定稿、发稿，不再求名家批准，不再需齿、爵审阅。看来，《青年论坛》带了个好头，这是第一点可贺的。

《论坛》创办时找过我，我写了篇小文略表支持。落笔时，在我面前浮现的是这些年来常见的那些认真而颇有傲气的面容、手势、言语以及信件。我从不怀疑他们的热情和力量，但我总担心他们文章的学术质量。我对他们强调，不要发那些只图一时痛

快却经不起科学推敲的文章，免使刊物刚开头就砸锅。结果一年以来，刊物不仅没砸锅，持续办了下来，而且据说反应还不错。这说明年青人比我实在要高明得多。这个刊物的确发表了好些在别处较难看到的饶有新意、颇有胆识的文章，提出了或初步论证了好些相当尖锐和敏感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这恰恰是饱学之士、老师宿儒们所未敢容易下笔的。尽管这些文章欠成熟，有毛病，但它清楚地显示了年轻一代强烈追求改革的理论锐气和朝气。象《为自由鸣炮》（胡德平）发表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了。象《论一九五七年》（沉扬）、《胡风系列研究序（上）》（万同林），论及了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没人碰或没人敢碰的问题。其中《论一九五七年》的好些论点是具有相当深度的。《青年论坛》敢于在学术上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打破人文学科的陈旧格局和迂腐学风，这是第二点可贺的。

我在创刊号的文章中曾不客气地批评说，“题目大而论证少，分析不够而空话略多”。我原想，这些话大概会因不受听而被删掉或改动。结果，他们不但欣然接受，只字未改，而且这次还特地要我再公开提些意见。年青人比我要宽容大度和更有理性。这使我既感动又惭愧且为难了。因为忙于别的事情，他们的刊物我很少看。有的文章看过也淡忘了。倘仅就没忘记的上述两篇文章说，我虽肯定，但也有意见：《论一九五七年》毕竟只是个研究提纲，论证和材料都极不够，不能算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讲胡风的文章的好些论点，如说他在文艺理论上是“第二个鲁迅”，说他与鲁“在性格、经历、能力、贡献等诸多方面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等等，我是觉得论据极为贫弱，而期期以为不可的。尽管因赞扬胡风，我在那次运动中也被株连。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要有情感，但感情毕竟不能替代研究，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吧。总的来说，《论坛》在表达年轻一代的学术意向、交流信息、观念和经验，启发人去

作进一步的探索是成功的。但如果严格要求学术性，则应该说还远不够标准。因此，如何在如此浓缩的篇幅限度里加强科学信息和质量，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论坛》编辑部既要我批评，我就批评了，也许批评得不对。《青年论坛》具有欢迎批评、不怕批评的态度并保持下来，这是第三点可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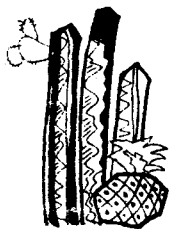
有开风气之先的魄力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加上欢迎批评以不断改进自己，以此三对彼三，除陋习，立新规，如能持之以恒，真积力久，则必然恢恢乎其游刃有余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于是大有希望。

（上接第22页） 自动保护装置处于闲置状态。一旦一个大分支出事时，自动保护装置也承受不了。但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中，自动保护装置的作用就很大。商品经济越普遍化，商品生产越发达，社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就越大。如果在今后的经济改革中要形成广泛的资金、物资、技术和劳动力市场，那么，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保险网络与之相匹配。

（由于文字所限，本文所提方案皆为概括介绍，详细方案必要时将专门提出。）

（作者袁璋，34岁，工作单位：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

（本文责任编辑 鹏云 一鸣）



袁璋同志：

大作拜读，分析得很中肯，可谓切中时弊。贾谊在《治安策》里说过：“方今之势，如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举不可曲伸，一二指搐，身屡无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事实上西汉的情况，已重睹于今日。但西汉盛世还算好，演变到了东汉桓灵，真的不可救药了。

西方有一本名作，叫《帕金森定律》，分析了英国内阁的变迁，讲了许多领导班子的领导效率的规律。

我国缺乏管理科学良性循环，特别是反馈失灵贻误和人治片言僵化为其大病。如此顽症，看来没有三十到五十年的不断改革，还不容易治好呢！须有象你这样的先知者在干部队伍中数量上占了优势后，改革就会加快。

深望大作能够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发表看法。当兹改革之机，说不定可以提供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时间不多，只能略写数行，以作同声之相应。望谅其草草。

杨纪珂

9.3

（杨纪珂同志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安徽省副省长。）

我国经济社会系统运行机制

故障之分析及解决途径

○ 袁 璋

第一部分：阻力来自何处？

一、信息失真与政策变样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指令性信息。你说话供他参考，他说的话你就干。指令性信息是怎样传递下来的？最常见的是中央——省——专区——县——企业（乡）——职工（农民）。逐级传递。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会失真的。假设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平均每一级的失真率为0.1，则从中央经省、市、县、乡、村5级到农民的累计失真率是41%；假设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平均每一级的失真率为0.2，则5级的累计失真率就是67%！

怎么办呢？可将中央的决定直接告诉每一个人，如登报、在电视台宣传。这样失真率当然很小很小，但总有许多指令性信息是不能完全借诸新闻媒介传播的。

可以要求各级都原封不动的传达。可是那样各级机构不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收发室了吗？

那么，要求各级机构在传达贯彻中央指示时把这些指示加工得更好一些，使这些指示相对于中央一级来说是失真了，但这是有益的失真，不就可以了么？然而事实上却不能都办到。由于各级机构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失真并不象电子线路那样偶然的，

而是带有主观意识的，有倾向性的。因而倒是有的机构首先会使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利的”信息发生失真。

二、信息处理手段与机构膨胀

文山会海象是过街老鼠，至少在报纸上。割文山、填会海的“经验”也介绍了不少，但实际收效不大。因为大量的发文、开会是为了传递信息，在新的、更好的信息传递、处理手段普遍采用前，起信息传递作用的公文、会议就少不了。

机构设置也是如此。机构是要处理信息的。按现在这种信息处理方式、手段，信息越多，所需机构就越多。日益增多的信息将导致日趋庞大的机构。机构多了总得发号施令，就造成更多的公文和会议。文和会多了，又要求设置更多的机构来应付；越来越多的文、会、机构，又制造了更多的信息，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进而又要求有更多的文、会、机构来传递、处理。螺旋上升，恶性循环。

笔者当然不以为文牍主义、会议成灾、机构膨胀合理。而只是说如不改善信息处理手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日益增多的信息将导致机构日益膨胀，文山会海日益严重，精简机构的任何方案都不能奏效。

三、机构设置与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倒不跟机构膨胀同步。

机构设置通常有两大类。一类是横向并列的，一类是纵向分层的。近年“机构改革”，大都采用横向并列式的结构。即取消工交口、农林口、财会口等纵向层次，各部委厅局直接向同级政府（党委）首长负责。一般认为减少了“口子”这个中间层次，首脑直接指挥部委厅局，工作效率会变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拿一个市来说，在市政府内设立几十个比如50个互相平行的局级机构，直接向市长们负责，工作效率是不可能高的。因为，

第一，信息传递通道的跨度有限，市长们实际直接管不了几

十个局。

第二，平行机构越多，相互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越大，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三，平行机构越多，扯皮的事越多，“市长当局长”的可能性越大。平行机构之间发生了矛盾，谁来协调、拍板呢？市长。市长被下属部门牵住鼻子，不得不处理本应由下属部门处理的事。许多本应由自己处理的事，要么丢掉不管，要么由下属部门代办。“市长当局长，局长管全市”，结果如何，自不待言。报纸上常有关于蔬菜市长、山羊县长、豆腐书记、马路市长的美谈，这比起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自然是好多了，但如此这般还不如汉代的陈平高明。

第四，平行机构越多，基层要办成一件事就越难。比如某工厂要办一件事，必须有10个平行的局同意才能办成，那么在短期内办成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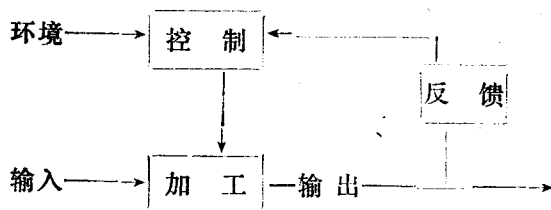
第五，平行机构越多，分工越细，各部门都不管的事就越多。为了处理这些“三不管”的工作，只好成立名目繁多的“领导小组”、“委员会”，其人员往往从常设机构和基层单位中“借调”，从而又削弱了常设机构的工作效率，影响基层工作。

系统论和概率论的原理表明，按现行的办事程序和信息处理手段，在平行机构林立的情况下，办事效率低是必然的，效率高是偶然的。恢复过去普遍采用的设口分层管理的结构行不行？不行。实践已证明纵向分层式的机构设置方式工作效率也不高。

四、目标决策与运行

一个正常运行着的系统，通常由输入、输出、加工处理、决策控制、信息反馈诸子系统组成。下页图是一个最简单的系统运行框图。输入的可以是实物，如人力、财力、物力，也可以是信息（包括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输出的当然也是这些，但在质与量上已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已经过加工处理的

缘故。决策控制部分无疑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它通常受到周围环境、既定目标、自身运行情况的制约。反馈系统的作用就是将系统的运行情况特别是输出结果及时向控制系统反映。



经济—社会运行系统的反馈器在哪里？一个中央文件下发了，布置收集情况反映，几天后逐级上报，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是临时反馈器中的螺丝钉。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反馈系统的机构是不健全的，职能是不完备的，作用是不充分的，信息传递是不及时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都不甚清楚，决策控制系统作出的决策能不发生失误吗？对整个系统的运行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吗？

决策控制系统所面临的乃是多目标决策。现代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决策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决策者是一个群体，或者最高决策者手下要有若干决策辅助人员。决策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在最终决策之前总是伴随着若干有选择的预备性决策；在最高级决策之前已经过了多次低层次上的决策，对大量重复出现的，带有程序性的事件的处理可借助于法律形式来决策，等等。与决策艺术相伴随的就是决策的水平、效能。可惜的是我们有些高层次上的决策一下子就是最终决策，或者决策后再搞“可行性论证”；决策不注意与法律规定相衔接，甚至当儿戏。

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系统里，决策与执行是分开的。假如决策与执行合一，整个系统将对许多偶然的刺激反应灵敏，而对整体的运行目标的控制就差，系统运行偏离目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如果同时再缺少信息反馈，等到系统运行偏离目标很显著时才发觉而下达调节指令，那么系统的运行就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一个高明的机械设计师是不会设计这种机械的。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最好也不采取这种形式。

然而我们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却与这种不完善的系统有若干相似之处：决策系统与执行系统合而为一，反馈系统不健全，决策存在着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决策的精度和预见性不很高，因而系统的运行不很平稳，不得不在若干时间后就对系统运行作较大的调整。

五、小小的例子和推论

高层次上的决策者并非不知道信息反馈的用处。报纸上常有这样的报道：甲部长到柜台卖东西，问顾客对该商品意见如何，而后通知生产部门多生产（或停止生产）该商品；乙书记到农村走访，倾听群众的心声，而后下达了一个紧急补充通知；丙同志下基层，不预先通知，不多带随员，了解了真实情况，等等，都是美谈，毛泽东同志也强调过，要搞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先行试点，而后总结推广。这当然比闭着眼睛捉麻雀，从本本到本本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高明得多。然而这种随机调查的样本必须十分充分，否则代表性就很差，结论就不准。如果被调查的样本点不多，即令在这几个点上了解到的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对于我们这个10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的代表性也是有限的。您上柜台卖服装，甲说西装好，乙说中山装好，该生产哪一种呢？其实很好办，把这项任务交给专门从事消费品市场行情分析的同志去吧。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决策者还不太习惯通过建立完善的、高效的信息反馈系统来帮助自己决策。

因为没有健全的信息反馈系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及时的、准确有力的指导就很困难。只好高度抽象一些，高度原则一些，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当然笔者决不

认为谨慎不好），随时准备“纠偏”、“调整”；作为下级，不如照抄照搬来自上面的规定，又方便，又省力，一个框子套到底（这本身仍是对中央指令精神的一种失真），一阵风、一刀切还能少得了吗？

六、缺乏横向联系和横向协调

我们这种反馈功能很差的、金字塔式的纵向指令性信息传递系统是怎样组建起来的？从党的一大起，不论是工运、农运、学运，还是武装起义、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接管或新建工厂、学校，都是一级任命一级，一级指挥一级，下级向上级负责，全党服从中央。在夺起政权的年代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也不允许有广泛的横向联系和多层次的反馈，金字塔机构的运行效率是很高的。

全国解放后，工作重心已经转移，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组织商品生产，必须发展广泛的横向联系和多层次的信息反馈。但由于根据阶级斗争需要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程序的惯性作用，由纵向金字塔系统向横向网络状系统的转化进行得很慢，时至今日，尚未完成这项转变。

经济活动中的横向联系是非有不可的，横向联系渠道又不畅通，因而只有借助于现有纵向渠道来传递横向信息；经济活动中的横向协调是非有不可的，林立的平行部门又不具备横向协调的权力和功能，因而只得借助于现有纵向指令系统来进行横向协调。比如一个乡办工厂要与附近的一家部属企业进行经济技术协作，尽管双方愿意且相距不远，却经过乡、县、市、省、国家计委、部、司、处8个环节，历时半年才有可能解决。

改革中人们都主张放权，减少纵向控制，给基层和企业以活力，这无疑是对的。但一定要同时建立和完善横向联系渠道，强化横向协调部门，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信息反馈系统，否则横向信

息就不能传递，横向协调就不能进行。

七、主语和谓语

上述自上而下任命组建的金字塔系统管理经济活动，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党政不分。政府是党组建的，工作班子是党委任命的，企业是党和政府兴办的，企业领导人是党和政府任命批准的，党政之间，政企之间，能截然分开吗？工厂企业从选址到开工，从资金原材料、设备到劳动力，都是党和政府决定的。企业的权力是谁给的？党和政府给的，甲工厂是地师级，乙学校是省军级，丙科研院所是县团级，不仅表明这些学校、工厂、研究所必须隶属于政府部门，而且也明确了身份、地位。党政军系统的组织层次等级成为一切企事业单位部门的参照系。

2、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下级是上级任命的，明白人启用明白人也好，糊涂人启用糊涂人或启用他心目中的明白人也好，反正下级得依附上级。一言堂，一阵风，一刀切，都跟这种自上而下组建任命的结构密切相关。顺便说一下，上一级直接任命下一级的干部，固然减少了更上一级的制约，但也更加强了下级对直接上级的依附，即俗话说的：不怕县官，就怕现管。

3、对下级的左右部门可以不负责任。无穷无尽的扯皮，以邻为壑；视部下为草芥，任意践踏，等等，都可能出现。

4、人治的作用大于法治。既然上级的自由度比下级大得多，法律又怎么会制约到上级？除非更上级用法治形式管住他。但仍然恰恰是体现了人治的威力。

这几个特点必然导致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和被合理使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总是步履艰难。“起用人才”也好，“落实政策”也好，语法上都是动宾结构，主语是“我”，“我”并不存在非起用落实不可的动力和压力。劳动力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至少在名义上），人才是高质量的劳动力，人才的作用不能充分发

挥，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效率当然不会高，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当然不能很快增加，与……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八、正反馈强化了失误

系统在运行时，常会与既定目标偏离。这就要求决策时应根据反馈来的信息及时调节系统的运行。如果系统已经向左偏离了，反馈来的信息却是向右偏，决策子系统据之而下达再向左的指令，那么整个系统就左得更厉害了。这种使决策指令与运行偏差同向的信息反馈就是所谓正反馈现象。强烈的正反馈将导致系统运行失误乃至系统崩溃。

金字塔式的纵向指令系统的反馈功能不完善，但并非没有任何信息反馈渠道。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总是会有信息反馈到决策中枢的。信息在反馈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筛选、放大的。而自上而下任命组建的、下级对上级存在一定依附性的、决策与执行合一的、金字塔式指令系统的一个特点就是负反馈信息容易被滤掉，而正反馈信息特别容易被通过和放大。十年内乱时期“就是好”的强烈信息反馈就是正反馈破坏系统正常运行的例证。

由于缺乏多层次反馈渠道和横向联系渠道的纵向指令系统，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失真，而且这种积累失真率很高。因而对最高层次上的决策人员来说，常常会感到这个系统不是按他预定的意图在运行，各级都在搞修正，到了下面简直大大变了样，中间有梗阻，可又难找到；又由于这个系统是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要纠第8级上的偏，立即涉及到第7级，要解决第4级上的问题，必须第3级赞同。有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甚至从10级一直涉及到第2级。本来要打第8级上的“苍蝇”，倒“查”出了第2级上有“老虎”；反过来，“发觉”第2级上有“老虎”，顺藤摸瓜，第3、4、5级每一级上都有“小老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这个结论一得出，自觉有力量者就下决心摆诛仙阵，炮打司令部了（当然“文

革”爆发的原因不仅于此），正反馈信息又表明，“翻案不得人心”，结果，一乱就是10年！

第二部分 希望所在

一、要求和特点

笔者认为新的运行机制要能充分体现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同步和党的最终目标控制这三项要求；要实现从横向金字塔系统向纵横交织的多层次网络结构的转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能设想，主人反而不能流动。流动就是空间位置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劳动力（包括人才）的流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料、科技成果、劳动力在连续不断的流通和流动过程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经济社会巨系统中的组织管理子系统不但不能阻碍、束缚、分割这些联系，而是要促进发展这种联系。因而我们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就不能搞成条条专政或块块分割的模式，不能搞成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人才与合适的岗位分离的模式，不能搞成企业依附于政府，人才和劳动力依附于上级的僵死的模式。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者，但设计师不等于工艺师，决策中枢与执行中枢不宜合而为一，党不能也不应该对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政府部门的运行实行至高无上的绝对控制，但又要从整体上把握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巨系统的运行，因而这个组织管理系统要能充分实现党的最终目标控制。

二、党政分开的起点

现行党和政府的组织管理形式显然是不能取代本文所讨论的这一组织管理系统的。换言之，要改革。党要实现最终目标的控制，因而最高层次上的决策者必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全会及其政治局），但系统运行的一般原理决定了最高层次上的决策者不宜同时成为最高级的执行者。作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最高组织实施者应当是最高行政首脑机关（国务院），作为党自身的